



您的位置：首页 - 最新观点

杨涛：市场经济之痛与货币自由神话(2004年8月6日)

文章作者：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经了改革的风风雨雨，发展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然而，进入21世纪，在国人开始为市场化改革的成就而沾沾自喜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却受到了来自众多西方国家的质疑。6月3日和28日，美国商务部和欧盟都初步否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就目前来看，发达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技术引进、经济发展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对于许多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的中国经济部门来说是不公平的，中国企业面临无休止的反倾销诉讼就是一个例子。无论如何，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因此怎样来适应国际博弈机制，说服它们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合法性，成为我们争取国际经济利益的主要环节之一。而怎样来进一步认识我们自身的资源配置体系，则有刻骨的市场经济之痛。

观古阅今，不由使人感触万千，抛开主观性判断不提，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辨中，有三点值得国人深思。

其一，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迈入市场化轨道以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是举世公认的，市场机制已经在资源配置和价格决定的大多数层面发挥基本作用。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体制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传统计划经济手段被抛弃后，有两方面新的非市场因素开始侵蚀中国年轻的市场经济肌体。一方面，行政性因素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宏观调控与微观运行机制中，构成了各种“体制复归”的现象。另一方面，新旧体制接替中的制度缺损，使得各种形式的利益集团逐渐成为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重要影响力量，并破坏着许多市场机制较脆弱的经济部门的运行。

对于前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还没有进行合理的职能定位，从传统体制下的经济管制者，转变为当前的非正常竞争者和“父爱主义”者。所谓非正常竞争者，是指政府部门或机构在超额市场利润的吸引下，常常会忘记自己的“市场经济守夜人”角色，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同私人主体的竞争中，这也是中国缺乏合理的公共选择机制所造成的结果。所谓“父爱主义”，则是指对政府能力的过度迷信与行政崇拜。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起作用的应当是“市场失灵”的领域，然而市场失灵的领域并不一定就应当由政府来调控，因为“政府失灵”的成本或许会比市场失灵要高。同时，对行政手段的崇拜，也使得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往往会舍弃市场手段而选择行政手段。也许是由于行政手段更得心应手，更容易产生效果，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在很多方面还缺乏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环境。

对于后者，利益集团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转轨过程中，利益集团往往是作为一个模糊的概念出现的，更加确切地说，它是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参与投票并影响政策结果的“压力群体”，这样的群体可由于外因内因的作用暂时结合起来，在某项公共政策制定中保持一致的选择，也可以达成非正式的默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支持或反对。事实上，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利益集团，对于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不足与社会福利损失都负有一定责任。

总而言之，市场经济成为国人心中之痛，既有外因也有内因的作用。在对外争取的同时，痛定思痛，为了消除市场化过程中的弊端而推进深层次改革，是使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必要选择。

其二，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更多地体现为国际政治问题。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中，经济与政治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济问题可以通过政治活动来解决，政治行为也可以诉诸于经济交易。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看到，正是由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独特的战略地位，才使美国充分利用是否承认市场经济地位来谋求对华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在国家间的博弈中，除了理解和认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基于成本分析的政策选择。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否，是其国际政治利益与国内公共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中国独立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使美国在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这样，充分利用中国不同于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来做文章，长期维持能够影响中国对外策略的途径，并在最大程度上打击中国的政策独立性，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会牢牢抓住的好机会。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也影响着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进行的公共选择。在政治上仍然延续了美国部分政客把中国看作具有潜在威胁的战略对手的需要，而在经济上则反映了在这一问题上立场不同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例如，假如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受到损害的可能是美国的部分低端产业的厂商与工人；而如果中国不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在华投资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厂商就可能会在中国的反制措施中受损。

有鉴于此，中国在与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中，既要努力使得美国人理解中国国情，也要研究美国在产生该政策中的公共选择过程与约束机制，从经济政治成本的角度对于美国政府的意图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可承受的经济政治代价。

其三，货币自由是否神话？。在中美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中，货币可兑换性是第一问题。美国国内的一种典型观点是“中国现行的汇率体制使中国得到了一种不公平的贸易优势，造成了对美出口的商品价格低廉，而美国对华的出口商品价格偏高的问题。因此，美国不能够把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待。”

应当说，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是市场经济最大的神话。1976年1月8日IMF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并达成“牙买加协定”，开始形成以美元为主导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和以浮动汇率为主的混合汇率体制。此后，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以货币自由兑换为特点的浮动汇率体系成为新的金融时尚。但与此同时，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时代。当外汇市场容量扩展至十分巨大的时候，汇率制度的无序加剧了一国外汇市场的风险，于是更多的国家政府开始动用外汇储备在市场上干预本

币汇率。

这里值得关注的，有三方面问题。一是货币自由兑换虽然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但完全货币自由化给一国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风险和效率损失也是无法忽略的。二是在当前各国的汇率体制下，真正的货币完全自由兑换是不存在的，总是会受到政府的某种约束，这既表现为兑换制度、规则、条件等方面的约束，也表现为政府为稳定外汇市场而经常进行的间接干预行为。三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所大力倡导的货币自由化，与自由女神像一样也只是某种象征而已，纯粹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汇率是天方夜谭。在1985著名的“广场协议”之后，美国政府为了遏制日本而进行的外汇市场干预，间接使得日元大幅上升，对于日本经济后来的持续衰退起到了很大影响。这样看来，在货币自由兑换的背后，国家利益的考虑也会超过美国的市场崇拜。此外，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所倡导的货币自由兑换，实际上是要要求中国放弃盯住美元汇率，这对于美国来说更可能是一种基于政治考虑的姿态而已。因为在美元作为定值货币的情况下，美国享受的是货币利益，而没有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当然，从长期来看，货币自由兑换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必经之路。我们所强调的，仅仅是认清货币自由神话对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涵义，在此基础上有序地推进金融深化进程，防止在追求地位合法性的同时，却过快陷入某种自由化的陷阱。

文章出处：《经济学消息报》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中国博士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
保险与经济研究中心

IFB外商投资中心

IFB基金研究
与评价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65136039 传真：010-65138307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